



苹果花下

4月的昭通,春寒未退。晨雾如纱,缠绕在乌蒙山的褶皱间,风从山石与夜露中钻出,带着刀锋般的凛冽,刮得人脸颊生疼。驱车驶入洒渔镇,田地仍是赭褐的土色,杨柳刚抽出鹅黄的嫩芽,周遭沉寂,心亦微凉。

然而,拐过一道弯后,光景骤变。眼前是一片苹果园,枝丫间缀满了云絮——不,是花,是苹果花。粉白、浅绯层层叠叠,将整片果园晕染成轻烟似的梦境。清风过处,花瓣簌簌而落,如一场无声的落雪。繁花与料峭春寒形成奇异对峙:一边是生命的盛放,一边是不肯退场的凛冽寒意。

下车,步入苹果花海深处。就在这花香与寒意的交融之处,我遇见了洪浩昌。他静立于一棵苹果树下,微微仰头,目光久久凝望着簇簇繁花,仿佛在与它们对话。他的身旁是画架,上面绷着大幅画布。走近,只见他长发束于脑后,鬓边已有风霜,面容温煦。他身上的皮夹克厚实保暖,握笔的手裸露在外,指节稳定有力。

我的脚步惊动了。他转过头,从那种深沉的凝思中回过神来,看到我,他并没有被打扰的不悦,反而立刻漾开了一抹淡淡却极真诚的笑容。“你好!”他招呼道,声音不高,带着昭通乡音特有的、温厚的质地。“早上气温低,冷得很。”话音未落,他已弯下腰,从脚边拎起一个便携式电暖炉,“啪嗒”一声,橘红色的光晕瞬间漾开一小片,暖意也随着光晕一丝丝弥散开来。随后,他从旁边的小马扎上拿起一件厚外套递给我:“披上,当心着凉。”动作自然如同给自家兄弟添衣。

这个动作、这个瞬间,像一粒小小的、温热的石子,投入了我此前被春寒浸透的心湖,漾开一圈圈无法言说的涟漪。在这片空旷的,仍被寒意统治的田野,一位沉浸于创作的画家,首先想到的不是他的画布,也不是他的构图,而是对一个陌生访客近乎本能的体贴。这份体贴,与周遭料峭的空气形成了第二种奇异的对峙,却比满树繁花更触动人心。电暖炉微弱的橘光不仅驱散了寒冷,还点燃了某种精神上的暖意——一种在孤寂的艺术跋涉中,依然保有对他人的关怀。

“艺术家应该代表人类去发现一些生活之外的,可能被忽略的美好。”洪浩昌目光投向远方,轻声说道。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他手中的画笔,正是为了捕捉世间易逝的温柔。

“在这儿待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莫名的安心,乡愁也悄然散去,化作一幅具体、美好的画面。”他补充道。原来,这份春寒中的创作激情并非无根之木,它源于一种深沉的生命体验——在这里,他不仅是在作画,还是在用色彩为灵魂寻找一个安放的家。

太阳渐渐升起,陆续有人走进这片花海。年迈的、二婶蹒跚而来,放学的孩子蹦跳着跑来,扛着摄像机的游客匆匆赶来,还有青年画家闻讯而来和他一起写生。他搁下刮刀,笑着迎上去——打招呼:“二婶,咳嗽好点了没有?”又蹲下摸摸孩子们的头:“功课做完啦?”来,站这儿看叔叔画画。”随后,又与青年画家们亲切地交流创作感悟……



(本版图片为洪浩昌及其艺术作品)

眼前呈现出一幅动人的画面:洪浩昌在苹果树下作画,身边围着不同年纪的人。他们的话题跳跃而自由,从柴米油盐到哲学、艺术、宗教、生活,始终流畅自然。无论谁开口,洪浩昌都会转头认真倾听,语气温和地回应。对我这个素昧平生的访客,亦如久别重逢的兄长般暖心。

原来,艺术现场并非封闭的圣殿,而是向所有心灵敞开的庭院,只要愿意驻足,便能分得一份暖意。

轨迹:从乌蒙山到北京

洪浩昌的艺术并非凭空而起,它深植于一片粗粝而丰饶的土地,又在时代的激流中几经淬炼,最终形成了从乡土出发、穿越都市、复归本源的完整精神闭环。

他并未多谈自己的过往,只是偶尔在目光从画布移向远山时吐露几句。于是,在这片寒意料峭、繁花似锦的苹果园里,在刮刀与油彩摩擦的细微声响中,一位艺术家的精神地图,随着他的言说与我的遥想缓缓铺展开来:那是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始于乌蒙山的褶皱,途经西子湖的烟雨,最终抵达京华烟云深处,而后又像候鸟般,年复一年地飞回这片故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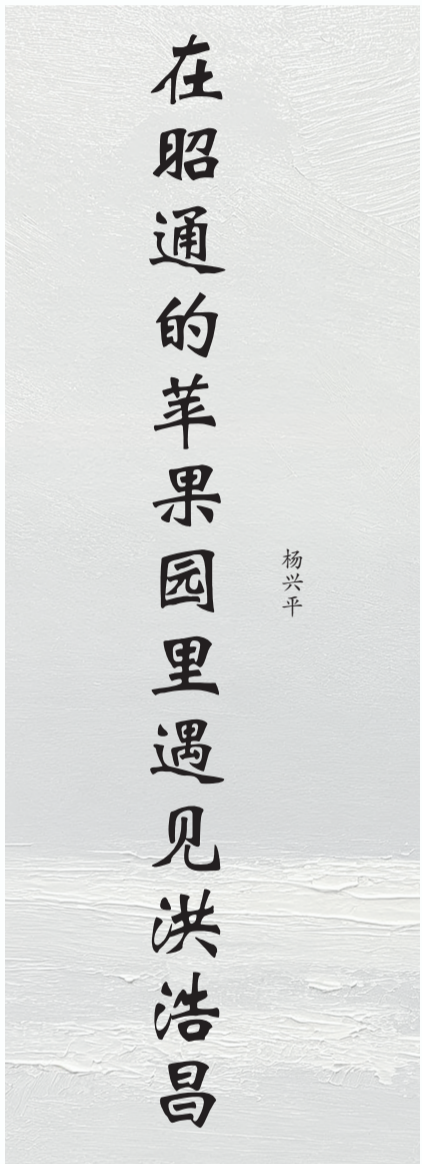
他的起点,就在这片土地的深处。昭通市靖安镇,一个被乌蒙山臂弯环抱的地方。这里的山嶙峋粗犷,轮廓线条如斧劈刀削;这里的水奔涌而下,带着未经驯服的野性。洪浩昌的童年便浸润在这样的山水之间。这不是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想象,而是一种更为原始、更为本质的共生。山石的肌理、流云的变幻、四季轮转中草木荣枯的色彩更迭,这些都不是课本上的文字,而是他呼吸的空气、触摸的土地、目之所及的日常。艺术的种子,或许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凝视中悄然萌发。髫髻之年,他便对丹青流露出超乎寻常的兴趣与才情。那是一种未经雕琢的、近乎本能的创作渴望,如同山间的溪流,想要寻找奔流的方向。

乌蒙山水给予他的,远不止绘画的素材,更是一种“师法自然”的原始信念,一份对土地深沉而纯粹的眷恋。这份眷恋如同胎记,深深烙印在他生命的底色上,无论日后走得有多远,那份故土赋予的质朴、厚重与生命力,始终是他艺术灵魂中不可割舍的内核。

清明时节,他总会回到老家的后山祭祖,那里长眠着他的七代先祖,而洪氏家族血脉绵延至今已逾七代。这份厚重的宗族情怀,塑造了他的责任意识,让他觉得,一个人的成功,不应只属于他自己,而应惠及整个家族,以及脚下这片养育他的土地。这便是他的艺术植根于深厚的家族责任感和故土情怀的最好注解。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96年。洪浩昌离开了雄浑的乌蒙山,考入以精致、典雅、融合中西艺术而闻名的中国美术学院。杭州,西湖畔烟雨迷离、园林幽深,是与昭通截然相反的另一重美学世界。在这里,他接受了系统而严格的西方绘画训练,从素描到色彩,从透视到解剖,一扇通往广阔艺术天地的大门向他敞开。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西方艺术的精髓,梵高笔触中的激情,塞尚作品中结构中的理性,都在他年轻的心里激起回响。

然而,这种吸收并非全盘接纳。学院



杨兴平

的教育开拓了他的视野,也让他开始深思:一个来自云南的青年,如何用西方绘画技法来诠释东方的精神内核?

答案的雏形,在他毕业不久后渐渐显露。

2002年,《园林组画》惊艳问世,立即在艺术界引起巨大震动。人们发现,这位来自乌蒙山区的年轻人笔下的江南园林,并非对古典意境的简单复刻,也非纯粹的西式风景写生。他用油彩的浓郁,去捕捉湖石的剔透、水光的空明;尝试用刮刀塑造厚重的肌理,表现飞檐的劲峭、花木的葳蕤。他的画作既有宋山水的静谧与深远,又饱含西方表现主义的情感张力。这组作品被视为中国油画民族化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探索之作。它标志着一个重要转向:洪浩昌已不满足于技术的娴熟,他开始有意识地寻找一种对话的可能——让东方的意境美学与西方的表现手法,在他的画布上“结婚生子”。

杭州时期,是洪浩昌艺术生命的“熔炉”。他将乌蒙山赋予的本真底色与从学院习得的精湛技艺相融锻造,磨合出初见光影的艺术风骨。

如果说杭州是熔炉,那么北京则是淬火的铁砧与锻打的重锤。

2006年,洪浩昌北上,成为一名“北漂”艺术家。从温润的江南踏入庞大、喧嚣、节奏迅疾的首都,文化上的撞击剧烈而深刻。他坦言,在北京常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人文盔甲的沉重”与“自然粗莽的缺失”之间的撕裂感。这座城市汇聚了千年积淀的人文底蕴,却也布满了钢筋水泥的现代丛林;这里充满了机会与梦想,也裹挟着竞争与漂泊的焦虑。这种撕裂,对于细腻的灵魂而言是痛苦的,但对于真正的艺术家,却可能转化为不竭的创作源泉。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心境下,洪浩昌进入了创作生涯的第一个狂潮期——“景观北京”系列。他不再描摹远方的园林和故乡的山水,而是将目光投向身旁的城市地标:天安门、故宫、鸟巢、国家大剧院……这些承载着历史底蕴和时代梦想的建筑,成了他画作里的主角。而他笔下的表现手法,也尽显鲜明的个人风格。他用大色

块、高饱和度的色彩进行刮涂,把那些庄严肃穆的建筑在画面中推远、拉宽,使其置于一种近乎超现实的、广阔而明亮的色彩空间里。画面前景常常是涌动的人群,身形微小如蚁,却又密密麻麻,充满动感。作品中的建筑是静穆的、永恒的,人群是流动的、瞬息的;浓烈的色彩是主观的、情绪化的,而建筑的符号又是客观的,承载着集体记忆。这种物象并置产生了奇妙的艺术效果:庄严的建筑被赋予了温度,厚重的历史融入了当下,宏大的叙事里掺杂着个体的渺小与人间的喧嚣。艺术批评家高岭从中看到了“历史与现实的重叠”,将之延伸至社会学的范畴。这已然不再是简单的风景画,而是一个艺术家用色彩和刀痕,对一座城市、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进行的深刻审视与诗意诠释。

在北京,洪浩昌真正完成了人文与自然两种视角的有机融合。他既用“北京的眼光看南国”,也用“云南的心灵量北京”。这种撕裂感,被淬炼成他艺术作品里最具厚度与张力的一层铠甲。

从乡土到世界

所有的出走,都是为了更好地归来。对于一个精神根系深深扎根于土地的人来说,长期置身于都市的文化洪流中,终会产生一种“难耐的人为饥渴”与“突然的失落”。而昭通,那个坐落于乌蒙山下的故乡,则是洪浩昌永恒的“乡土根基”、灵感不竭的源头,也是他情感最终的归宿。

于是,清明返乡便不再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选择,更升华为一场具有仪式感的文化行动,成为他至关重要的精神锚点。每年这个时候,仿佛内心的生物钟在鸣响,他会从都市的纷扰中抽身,回到昭通的苹果园,回到故乡的山水和亲人身旁。在这里,他呼吸清冽的空气,触摸湿润的泥土,凝望那些恣意生长的草木与繁花,释放对故土和亲人如“指尖上的蜂蜜”般偏执、纯粹又无比深沉的爱与牵挂。这场回归,是对自然力量的重新汲取,是对被“人文盔甲”包裹已久的心灵的松绑与涤荡。

洪浩昌说:“作为一个昭通人,表面上是我一个人走出去,实际上是我带着昭通所有的信息走出去。我现在又回来了,表面上是我一个人回来,实际上是我带着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和一个大时代的精神诉求回来了。”这是一个完美的循环系统:他从乡土汲取原始的生命力与情感密码,在杭州和北京精进技艺、拓宽视野,又于北京依托前沿创作,将这种融合提升至文化表达的层面。最终,他带着创作成果与思想能量返乡,通过艺术创作、公益行动反哺滋养自己的故土。出走,探索,淬炼,回归——这条人生轨迹并非线性单向的,而是螺旋上升的闭环。

每一次回归,都是洪浩昌带着更深厚的积淀、更清醒的自觉,重新认识这片土地,也重新确认自己何以成为自己。那复一年绽放的苹果花,仿佛也在呼应这一循环:它们扎根于寒凉的土地,默默积蓄力量,然后在春天不顾一切地肆意绚烂,将生命的密码托付给花粉与风,播撒向更远处,同时也将最美的瞬间定格于画布之上,成为跨越时光的精神符号。

画布上的绚烂,终究要面对大地的沉默。

对于洪浩昌而言,艺术的远征与精神的返乡构成了他生命的两翼。当他以刮刀与色彩在画布上完成一次次“以心造境”的壮举时,另一项更为庞大,也更为朴素的工程,也在他魂牵梦萦的故土上悄然展开。这项工程,不再仅仅关乎个人的艺术表达,而是将艺术家的赤子情怀转化为播撒在乡土大地上的种子。

洪浩昌在洪家营修建的居所一楼门楣上,题写了“游心楼”三个大字。这是他馈赠给父老乡亲的公益图书馆,如今藏书逾11万册,电子资源超10万册,免费向村民开放。孩子们放学后在此写作业,老人翻阅养生书籍,青年画家借阅画册临摹。馆名取自“游心于艺,归心于仁”,道出了他心中艺术的双重使命:既要飞升至精神

之境,也要落地于人间烟火。

筹建游心楼那年,洪浩昌才30出头,正值艺术市场起步之时。有人劝他:“不如开个画廊,卖画赚钱。”他却摇摇头:“钱能买书,但买不来光,我要把城市的光带进山里的黑夜。”

这束光,后来蔓延成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好色昭通”。洪浩昌说:“我们怕谈色太久,忘了色彩本是天地大美。”他设想在昭通2.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规模种植各色植物:春天梨花如雪,夏日杜鹃似火,秋时菊花遍野,冬日梅花点点;同时套种药材与果树,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体系。他的目标不仅是打造视觉奇观,还是营造出“可望、可居、可游”的立体画境,以此催生文旅产业链,提升地方文化自信。这不是乌托邦幻想,而是洪浩昌以艺术家身份投身乡村振兴的一次实践。他相信,美不仅能滋养心灵,还能激活经济。

更令人震动的是洪浩昌的文化构想——创建一个以上市公司为载体的文化IP运营平台,将自己的油画作为核心IP,通过品牌授权、文创衍生、数字藏品等方式实现价值转化。他说:“资本不是洪水猛兽,它可以是桥梁、航道,也可以是东风。”他希望借势而行,让中华文明中最柔软的部分——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对美的执着,借助现代运营模式走向世界。

这不是背叛纯粹,而是拓展艺术的边界。洪浩昌深知,真正的艺术,不在于孤芳自赏,而在于让更多人看见美、分享美、创造美。正如李文远所评:“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现实世界,悄然矗立了一座面对乌托邦式的灯塔!点亮希望,指引方向,成就梦想。”

守望者的生命闭环

若要定义洪浩昌,他既是守望者,也是革新者;既是联结者,也是播种者。

他是守望者,守护着宋代山水的气韵、文人画作的风骨与古典诗词的意境。在全球化浪潮中,他拒绝让传统文化沦为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将其视为活着的精神血脉。画中微小的人影,是他对“天地之大而人类何其渺小”的深刻体认;他俯瞰的视角,是“像帝王一样‘俯视’世界”的神性张力。朱良志评其“化磅礴的景为一角、一线”,正合老子“损之又损,以近于无为”的精神。

他亦是革新者,以刮刀破笔,以立轴破透视,以复合色破原色,发动一场静默的艺术革命。他用实践证明:创新不必背离传统,反而需深扎其中,方能长出新枝。其作品既具个人风格,又回应时代命题。他是联结者,在创作过程中消融阶层隔阂。老农、孩童、青年画家、陌生访客,皆可在同一片光影下自由对话。艺术家不再曲高和寡,而是和蔼可亲的邻家兄长,久别重逢的故人。夹杂在家长里短中的嘘寒问暖,不仅驱散了春寒,还传递出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暖意——艺术的价值,终究在于能否温暖人心。

他是播种者,愿以资本为风,以画作为舟,播撒中华文明的种子。从公益书屋游心楼到“好色昭通”文旅计划,从个体艺术创作到文化IP打造,他逐步构建起一个可持续的文化生态系统。在他看来,艺术不应止于画廊与拍卖行,更要归于人民、走向世界。

夕阳西下,为昭通的苹果园镀上了一层金色的暖晖,晚风也温柔了许多,不再那么料峭。洪浩昌仍在创作,画布上的《苹果花开》即将完成,那团粉白的灿烂,在暮色中仿佛会发光,与身后渐渐沉入幽蓝的花海构成一种永恒的唱和。

暮色渐起,洪浩昌的身影在广阔的天地与无边花海之间,显得宁静而坚定。他还在那里,以刀为犁,以布为田,继续着他一个人的耕耘。他站在苹果树下,看花瓣飘落,如同看见自己一生的轨迹——从一朵花走向一片海。

那海,不在远方,就在这片被春风吻过的土地深处,缓缓升起……